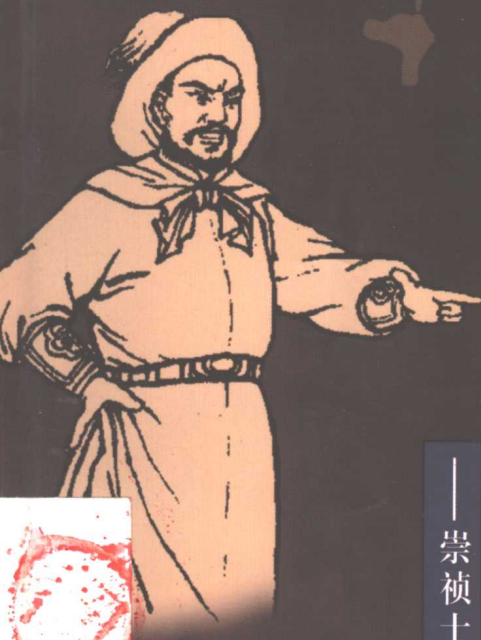


余同元 著



历史关键之年丛书



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

——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

河北大学出版社

历史关键

之年丛书

余同元 著

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

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文京

封面设计:张志伟

责任校对:杨金花

责任印制:李晓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余同元著. -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3

ISBN 7-81028-502-5

I.王… II.余… III.历史事件-史评-中国-1861 IV.K256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2780 号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 1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规格:1/32 (850mm×1168mm)

印张:11

字数:276 千字

印数:1~6000 册

版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3 月第 1 次

定价:17.50 元

出版说明

历史不能没有激情。历史的长河不会没有浪花。在历史的发展中,有许多年份给人留下抹不去的记忆,王朝更迭,革故鼎新,霹雳政变……这些具有“转折”或“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关键”而复杂的影响,使历史饱满而又摇曳多姿。为再现历史的“关键”,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历史关键之年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丛书不同于传统的史学教科书、史学论著,也不是某一年人物事件记录的“流水账”,或人物事件简单的罗列堆积,而是淘洗新材料,切入新视角,用清新可读的散文笔调展示历史,述说人物,使人深思,给人启迪,令人遐想。

丛书各册均以时间为经,以重要人物或事件为纬,选取若干重要之点,以点带面,连缀成书,人物、事件、时空,纵横交错,上接下连,有立体感、整体感,力图再现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丛书不是通“俗”读物，虽然写作手法灵活多变，但不失历史之尊。求“真”是本丛书的重要目的。

“历史关键之年丛书”第一辑共4种：《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余同元著）、《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池子华著）、《变政与政变——光绪二十四年聚焦》（董丛林著）、《彷徨与顿悟——一九一九年实录》（张同乐著）。

丛书从酝酿到出版，历时两年有余，虽然我们竭尽全力，但难免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读者给予批评。

序

崔明德

刘梦溪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中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流变，有三个历史分际之点最值得注意：一是晚周，二是晚明，三是晚清。”虽然这三个时期都是天崩地解、社会转型、传统价值发生危机、新思潮汹涌巨变的时代，虽然在形式上晚周与晚清变局及其所激起的思想界争鸣竟放与晚明大有不同，但在实际上，不仅“晚明之际文化裂变的深度和烈度丝毫不让于另外两个历史时期”，而且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的变化，还表现得“更隐蔽，更婉曲，更悲壮”。所以说“明清易代既是我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也是理解华夏学术嬗变的一个枢纽。”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晚年为什么要不惮辛苦、钩稽沉隐，“搜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费时11年而写成80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的缘故：因为“陈寅恪标举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明清之际表现得最见力度，而这也就是中华学术思想的精华和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唯其如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晚明时期即明清之际的历史研究。

作为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点和华夏学术思想变化枢纽的明清之际，其家国治乱、社会兴衰、民族存亡、人生忧乐和文化裂变等方方面面的兴亡鼎革，无不于公元1644年聚成焦点燃点，发为巨劫

奇变,而又转为社会转型之源头契机。因此可以肯定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历史变化最深刻的一个时期,而1644年(即明朝崇祯十七年,清朝顺治元年)则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大明王朝死而未亡,大清帝国兴而未定,李自成进驻北京又遽尔败退,张献忠称王四川而滥杀士绅,蒙古各部鸣镝北疆,西洋各国踟躅南洋,种种力量及其组成的各种矛盾相互作用,彼此激荡,构成社会历史之巨变。余同元教授继1994年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大作《张献忠传》后,又数易寒暑,完成了新作《王朝鼎革与英雄悲歌——崇祯十七年家国兴亡止观录》(以下简称《止观录》),可喜可贺。《止观录》运用多学科方法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社会史学派的研究模式,将丰富的史料与政治学、社会学及系统理论等多方面知识和方法融为一体,从社会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的角度论述这一年中国社会结构功能的转化,揭示本年度中国历史文化之巨变的前因后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能改变以往有关研究中偏重阶级矛盾探讨而忽视其他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研究状况。

“止观”乃佛教的一种禅法。《成实论》卷十八云:“止能遮结,观能断灭;止如捉草,观如镰刈;止如扫地,观如除粪;止如揩垢,观如水洗。”修止入禅可以减少烦恼,修观得慧可以超出轮回,可见止观之法乃是世间修道的精髓。以此法研究中国历代家国兴亡与文化裂变的历史,既是以超历史的态度,于诸多不同的历史现象形式中艺术地或哲学地去理解历史;又是以批判的态度摆脱历史加在人们身上的种种束缚,从而由止入观,循观顿悟,专心致志,深思入微地去认识历史的规律和人生的真谛,并洞开止、观双行之门,求得社会解放和人生自由之目的。《止观录》对1644年中国社会的裂变、国家的兴亡和历史文化之变奏进行整体的综合的和跨学科的研究,既揭示该年度春、夏、秋、冬的自然演化,又检讨融“天命”、“人事”于一体的一岁之中元、亨、利、贞的变化规律,借以揭示该年中国社会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互作用下各种社会力量分化瓦

解和彼此激荡的脉络与趋势，特别是对明末清初思想文化上的大变奏作深入地探讨，由此说明当时东西世界不平衡发展的根源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此所谓“止观录”是也。

中国历史的断裂与联结，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变中之不变——历史上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天下”；没有真正的法律，没有数量化的财政，也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有的只是家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和专制主义的擎制，外加道德伦理和思想文化上的根深蒂固。人们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更不知有个人。这样的国家，始终肩负着一种变中不变的周期率，一种使人性变质、使社会堕落、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这种可怕的周期率，被黄炎培先生描述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止观录》一书在注重 1644 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系统变化和相互制动的同时，侧重从地理环境、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上去探讨当时中国社会文化裂变的动力源，揭示整个社会大动荡和大变奏的前提条件。由此不难看出，中国衰败的病症乃是一种社会心理综合症：中国人之所以国难当头依然自相残杀，原因在于走不出那兴勃亡忽的周期率的支配。

封建政权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规律，有如事物由兴而亡的周期性律动，本来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可言，但朝朝代代跳不出“周期率”的支配，却给文人学士留下了无穷的困惑。特别是明清易代，一岁之中王朝鼎革、几易其主，中国历史竟走进了更为黑暗的清王朝统治之下，这使更多的汉人知识分子大为不解。明末清初的文人承受了历史沉重的压力和艰辛使命，在交织着血与火的崩溃中，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也选择了民族的命运，使那个时代所有的痛苦和秘密都深深地刻入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旅程之中，时代的

悲哀与个人的苦难融为一体，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忧患紧密相联，真可谓“文化神州丧一身”，其在《止观录》里有关刘宗周、黄宗羲师徒二人的叙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展读之下，深渊沉郁之气，歌哭无端之痛，无不催人泪下。所谓“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死生家国休回首，泪如湘江一样流”（陈寅恪诗），看似井中伤心史，实乃神州文化万种心思也。

1644年大故迭起，社会剧烈变动，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及现代的各种教科书中解释为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因而把历史上一切治乱因革都归结为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更化，现在看来是过于简单化了。因而不少学者主张明清之际既有阶级矛盾也有民族矛盾在交换着发生作用，表现为明朝、清朝和农民军三种力量相互较量，最终导致清朝一统天下。《止观录》认为明清之际是两对矛盾、四种力量在左右时局：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中，民族矛盾率先发展（详见卷二有关九边与大明国运的论述），激化了阶级矛盾；在明、清、李自成与张献忠四种力量之中，张献忠大西政权首先消灭了明朝的主力而又最终促成了联明抗清，李自成顺政权只是乘明廷同时败北于清政权和张献忠大西政权之机，利用“均田免粮”的口号打进北京城，但李、张均因自身素质的局限而失去了文人的支持，最终同腐朽的明王朝一起成为黠武嗜利的清政权的刀下鬼。游牧的清政权能够发展成为一统天下的大清王朝，关键在于努尔哈赤家族父子数人的英武能战和大力收买汉人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两对矛盾、四种力量在1644年春、夏、秋、冬发生了令人难以预料的变化，历史也就在这种必然与偶然中连续。但中国历史上农、牧文化的对峙从此也走近了尾声。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首先表现在中国版图上农、牧民族分、合道路的曲折漫长之上；而阶级矛盾所产生的“内忧”也就长期与民族矛盾产生的“外患”交替并作，“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也就长期使中原王朝左右为难。

《止观录》分“春之卷，农耕帝国的崩溃；夏之卷，游牧政权的南下；秋之卷，四个政权的较量；冬之卷，抗清悲歌”等四部分进行专题研究，在全面总结明亡清兴与两个农民政权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农牧民族由分到合的发展规律。在卷二《游牧政权的南下》和尾声《农牧一体、满汉一家》等章节中，作者指出，亚欧大陆的历史，因自然的人文的环境差异，形成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两个区域长期的双轨发展，同时又发生和发展着两个世界的各种交往和矛盾，构成近代以前整个世界历史的基本内容。中国的版图兼有南农北牧两大区域，也注定有着相同的发展路线，由周秦到明清，长城内外的对峙，农牧民族的分合，正是人类历史上农、牧世界二元一体化的历史缩影。中国文化是长城两边农、牧民族在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这种整合首先发生在两个世界的交接地带，形成以长城为枢纽的长城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在中国古代具有“内边疆”的形态，既是中原王朝的边防带，又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带。每个朝代长城文化带的演变都同长城两边的政治经济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明代长城文化带以“九边”为大致范围，其演变是周秦以降长城地带特殊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总结，也是中国长城文化带发展的最终形态。明后期交换型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长城文化带上近70个大、小“马市”市场的先后设置和兴盛，使长城文化带作为特殊类型的文化区域，出现了与中原文化区域融为一体的趋势。正是由于长城文化带自身的发展，才结束了长城两边长期的内外对峙和分合无常的局面，从而为北部中国在清代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止观录》在编写《1644年大事日记》的基础上写成著作，于详尽细微的史实中提炼出诸多发人深思的诠释，考证澄清了很多疑难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既宏观把握，又微观分析，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局限，开拓了研究视野。同时，作者重视辞章、义理、考据

三结合,使全书观点鲜明,结构严谨,有物有序,清真雅洁,大有作者家乡桐城文派之遗风。但最可称道的,还是作者立足于史学而又超出史学,为史学的大众化和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20世纪以来,史学出现了整体化与综合化的趋势,史学的整体化必须以史学的科学化为前提;史学的科学化首先表现为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特别表现为新社会史学派通过社会整体的历史研究和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求,史学既要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即求真求实的学术继承),又要超出史学自身而作用于社会。史学必须同现实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的联系,必须同广大人民群众发生密切联系,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史学只有首先把自己变成人民大众的精神财富,然后才能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由此可见,史学的大众化是史学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止观录》选取了与国家兴亡和民族命运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对之进行系统的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中肯的结论,并用人们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出来,既深入又浅出,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是一部高品味的科学著作,也是当前史学大众化和现代化中的力作之一。是为序。

99年元旦于烟台大学

目 录

序.....	(1)
序 幕 烈皇帝自残自绝.....	(1)
春之卷 农耕帝国的崩溃.....	(21)
1.败局算残棋 步步在劫.....	(23)
2.天人交相失 帝国气数尽.....	(48)
3.乡村暴怒 小民成敌国.....	(66)
夏之卷 游牧政权的南下.....	(99)
1.天下安危系九边 九边之首在辽东.....	(101)
2.大清崛起 虎视关内.....	(123)
3.山海关大战 紫禁城易主.....	(151)
秋之卷 四主争雄 九州干戈.....	(171)
1.清室定鼎北京 图谋天下.....	(173)
2.福王称帝南京 祚长命短.....	(185)
3.闯王退守关中 四面受敌.....	(198)
4.西王称雄四川 滥杀士绅.....	(208)
冬之卷 抗清山河泪 野服林居思兴亡.....	(235)
1.开国兴大典 荆发激民愤.....	(237)
2.抗清义师起 悲歌山河泪.....	(248)
3.家国旧情 兴亡遗恨.....	(263)
尾 声 农牧一体 满汉一家.....	(299)
附 录 1644 年大事日记	(318)
后 记.....	(337)

序 幕

烈皇帝自残自绝

甲申年(1644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潜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公元 1644 年——中国农历甲申年，
即明朝崇祯十七年，清朝顺治元年，
大顺朝永昌元年，大西朝大顺元年，
三月十八日上午，京师北京城内外。

狂风像洪水猛兽一般来回冲撞着，裹着草木，卷着尘土，夹着碎石和沙子，盘旋冲突于大街小巷，呼呼山响，嗷嗷直叫，使老树截枝断头，令湖水腾浪拍岸，直刮得黄沙弥漫，天昏地暗，使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飞沙走石的迷茫之中。忽然，一道闪电刺穿了压城的黑云，沉默片刻，一声异常激烈、干燥而又尖厉的霹雳炸彻全城，跟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

沉闷的雷声撕破了黑幕重重的天空，瓢泼的大雨冲打着麻木的地面，异样的猖狂放肆。俄而，强劲的雨点变成了密集的冰雹，冰雹借着风势，沉重地、兽性地、急骤地向下攒射着，击碎在房顶和地面上，乒令邦郎地交响成一片。一阵冰雹过后，又是电闪雷鸣，又是横风斜雨，雨中又夹带着冰雹……如此这般，从早晨直到午后，一阵紧似一阵。

这种奇特的天气，只有神话中方会出现，人世间何曾得见？恰恰许仲琳《封神演义》中的一段雷鸣风吼的描绘，竟与此不谋而合。其文曰：“风气呼嚎，乾坤荡漾；雷声激烈，震动山川。电掣红绡，钻云飞火；雾迷日月，大地遮漫。风刮得沙尘掩面，雷惊得虎豹藏形，电闪得飞禽乱舞，雾迷得树林无踪。那风只搅得通天河波翻浪滚；那雷只震得界牌关地震山崩；那电只闪得诛仙阵众仙迷眼；那雾只

迷得芦篷下失了门人。这风真是推山转石松篁倒；这雷真是威风凛冽震人惊；这电真是流天照野金蛇走；这雾真是弥漫漫漫蔽九重。”

《封神演义》写的是两位神仙的决战情景，而北京城出现此景观，却是大顺国王李自成和大明帝国皇帝朱由检二人最后决斗时的天象。^①

北京城外，自十七日以来，李自成指挥大顺军三路攻打平则门、彰义门和西直门，守在门外的明军三大营全线溃散，阵地上战车、火炮、铁蒺藜等构成的道道屏障，丝毫未能阻挡大顺军排山倒海的攻势。根据李自成的丞相宋献策占卜，如果十八日无雨，则京师不可破；有雨，则一攻即下。十八日上午，北京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大顺军用缴获的巨炮、战车和蒺藜，趁着凄风苦雨的掩护，向北京城发起了进攻。

摆在明思宗朱由检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缴械投降，要么拼命顽抗。

关于投降，又称“割地和谈”，按现代人的话讲就是谈判讲和。这确属最理性的文明途径，只是当时双方皆准备不足，毫无程序化和规范化，从根本上决定了这条道路的行之不通。尤其是对于那些“朕即国家”、“朕即法律”和“朕即真理”的万岁爷来讲，要同自己奴役下的“暴民叛卒”平等对话，举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政治游戏和指左趋右、声东击西的“踢皮球”活动，无疑是变相投降。只是每每想到铤炮攻城、万矢齐发、人财两空、玉石俱焚之惨象，人们又梦求通过它获得出奇制胜的效果。所以，李自成一面令大顺军武力攻城，一面派人提出了“割地讲和”的谈判条件；而在明廷方面，虽然思宗对和谈之事难以启口，但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最了解敌对双方的力量，擅自答应了李自成谈判的倡议。如是，一场既无诚意又无可可行性的谈判便悄悄地开始了。

北京外城彰义门外，李自成命以红毡席地，临时设殿发号施

令。首先命俘虏来的明晋王朱求桂和秦王朱存枢陪侍左、右，代农民军向城内军民传话，劝文武百官早早出降。同时派在宣府投降过来的明太监杜勋等人进城，转达农民军“割地讲和”的谈判方案。

上午巳刻，杜勋来到城下喊话，明襄城伯李国桢答曰：“我入你营为质，你当遣人与圣上（即思宗）面讲。”^②杜勋回答：“我杜勋一无所畏，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本来和杜勋是同事，现在一见杜勋代表李自成来与皇上谈判，相见叙旧自不待言，不定将来还能给自己谋条出路呢，便立即放下吊绳将杜勋缢上城来，送皇宫见思宗去了。

此时，思宗正在奉先殿中坐立不安，听说杜勋前来，立即命于平台召见。杜勋来到宫中，跪倒在思宗脚下，奏称：“臣奉了秦、晋二王令旨前来拜见陛下，尚乞陛下赦臣死罪。”接着转达了李自成的三项谈判条件：

一是请思宗封李自成为王，割西北地归大顺军管辖；

二是发给大顺军犒赏银百万两，大顺军随即退守河南；

三是大顺军不听明廷调派，不奉思宗召觐，但可为朝廷平定内乱，并以强兵劲旅阻止辽东清军南下。

当时城上城下，大顺军进攻的炮声一阵紧似一阵，缘城廨舍片片崩塌，矢石飞坠城中如蝟，守城的明军纷纷惊溃，阖城号哭奔窜。思宗自知大势已去，除了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以外只有死路一条，但又不能自己背了投降的恶名，便转身问大学士魏藻德：“此议如何？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谁知老奸巨滑的魏藻德竟一声不吱，只是一个劲地鞠躬俯首。思宗忧惑不解，起身站到龙椅背后，再次询问魏藻德意见，魏藻德叩头谢罪以外，仍是一声不吭。思宗心急火燎，焦躁万分，但仍然强压怒火，再三征询魏藻德意见，那魏藻德仍是守口如瓶，最终不发一言。思宗万般无奈，只好另派亲信宦官代表自己继续与李自成谈判，同时命杜勋向李自成传话说：“朕计定，另有旨。”企图拖延谈判时间，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来。^③